



下。当然，这也是确立这个公民教育制度时必须接受的代价或成本。

“视觉中心文化”：自然的光与拟制的光

最后，我们要引入一个有关希腊文化的更形而上学的议题。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，现代对希腊的文艺复兴也可以表述成“视觉中心文化”的复兴。“视觉中心文化”是在与中世纪犹太—基督教“听觉中心文化”的对立中界定自身的，后者假定存在一个来自超越世界的声音（真理），那个世界比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更真实、更本质，也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归宿。而“视觉中心文化”则认定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世界本身。但由于现代复兴了的“视觉中心文化”有一个中世纪的“听觉中心文化”的基座，所以，尽管两种“视觉中心文化”都依赖于光的呈现，但希腊的光是照亮表象的真实的自然之光，而现代的光更强调深入事物内在或本质的虚拟的推理（理性）之光。对于希腊人，一切存在，只有转化和呈现为一种可供观看的景观时才能确认，否则，那些既没有被照亮、又没有被看到的事物，则不只是在认识论上失身了，在存在论上也变得暧昧、不详和凶险，这导致城邦社会对一切深度存在的怀疑和敌意。而现代人的视域则通过理性之光的下潜，把希腊人的价值世界颠倒了过来：让希腊人敌视的一切阴影般的存在：社会深层结构、绝对精神、内在的自我与民族的灵魂等重获真理的地位，而把希腊人高度伦理化、审美化甚至本质化的表象世界再度抛回思想的野地。

让我们沿三个方面稍作展开。

一）希腊语中只有表象的 *persona*（面具、角色），没有内在的 *personality*（个性）。在城邦世界这个巨大的舞台上，公民在其中都是戴着面具的演员，他们处在戏剧情节的各个节点上，其意义是纯粹功能性的，没有内在的个人意义可言；而且这些节点只有前后或左右的位置上的差别。赫

拉克勒斯在攻陷特洛伊城的那个历史性瞬间，却把剑刺向第一个冲进去的特拉蒙——那是他的位置，他不允许另一个人冲在他前面。同样的道理，当帕特洛克罗斯戴着阿喀琉斯的金面具战死在特洛伊的战场上，阿喀琉斯就没有理由再活着了——面具就是他本身。

二）靠视觉来认领的世界注定是极其有限的。斯宾格勒认为城邦就是从卫城上所能看到的范围，希腊人对一切尚未进入他们视野的远方怀有形而上的恐惧本能，这驱动着城邦之间总是在相互倾轧中进行着惨烈的“生存之战”。这种战争在心理上都是防御性的——即便采取了攻击性的战略或战术——所以这种战争并不导致城邦之间土地的兼并或疆域的变更，他们也不会为了在政治上更好地组织乡村而去扩展他们的城邦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战争并不会转入帝国统一战争，希腊城邦世界的政治统一最终只能由外部输入——马其顿和罗马。还有，希腊人在精神上从没有表现出对“无限”或“巨大”（空间）的恶趣，这也阻止希腊人陷入抽象的普遍性：他们没有单数的“人类”（*humankind*）的概念，从不介意他人与自己不一样。

三）苏格拉底就死于为这个表象世界增加一个平行世界的企图中。希腊的神界不在人间，但也没有出离到另一个世界，它就在此岸的奥林匹斯山上。除了肉体不死之外，诸神与人“同形同性”，不仅形象一致，人类的七情六欲乃至滥情乱伦在诸神那里一样都不缺，诸神的命运也和人类一样被命运女神织进命运之网。但在柏拉图的“洞穴论”中出现了两个世界，洞穴内/洞穴外，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运行于这两个世界之间，并且越来越表现出对这个有限的洞穴世界感到不耐烦，认为它必须被扬弃和变形，所以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洞穴世界的恐慌和自卫，后者起诉他“引进新神”和“蛊惑青年”。这两个罪名表明希腊人已经感受到了他与这个时代的根本冲突——这个“新神”显然不再能归于希腊现有的诸神，它被苏格拉底描述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“声音”。（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）